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一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孙中山遭到驱逐	(1)
袁世凯逐渐成为中国军界的明星	(8)
一样的难题	(17)
孙中山当上了“本党总理”	(23)
革命思潮在南方涌起	(27)
辛亥革命	(32)
孙中山的两个秘密武器	(32)
黎元洪糊里糊涂就当上了都督	(38)
当选总统,和谈不成	(44)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	(52)
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	(54)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	(63)
袁氏独裁专制	(63)
唐绍仪拂袖而去	(67)
内阁混合	(72)
陆征祥内阁的风波	(76)
张振武之死	(82)
孙中山转向实业救国	(88)

“民国政党，唯我独大”	(93)
孙、黄联袂北上	(97)
复辟与反复辟	(103)
袁氏帝王思想的多元因素	(103)
辛亥后两股复辟势力的交错	(110)
“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一步”	(117)
《共和与君主论》	(122)
“筹安会”推波助澜	(127)
梁士诒后来居上	(133)
洪宪帝制粉墨登场	(137)
全国讨袁的声浪	(138)
中华革命党的斗争	(143)
孙黄重携手	(148)
梁启超师生的猛醒	(153)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59)
蔡锷一去不复返	(165)
蔡锷与云南独立	(168)
一枕黄粱梦	(173)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79)
独夫民贼之死	(185)

孙中山遭到驱逐

1897年8月2日，自英国维多利亚始发的皇后号船到达日本横滨港，清廷驻英大使罗丰禄在接到船到港的消息后签发了这样一个文件：停止追踪。大英帝国伦敦司赖特侦探社的专职侦探们也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这个中国人滚蛋了。

这个中国人叫孙中山。他下船后直接去的地方，是在日本的外人居留地¹³⁷番旅馆。在那里，有一大批革命党人等着他。按照现时的说法，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危险分子”，无论他到了哪个国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英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是这样描绘他的：“孙逸仙先生，一八九五年离去香港。当是时，香港政府据报：中国发生革命，党人几度举义，谋夺广州，孙均与于其事。嗣据探报：孙将有回港之行，香港政府行政委员会遂下令将其放逐出境。彼未违反当地法律，未被控告，亦未被官厅审判成立罪状。该放逐令现且是否有效，或有无为之申请撤销等情事，本席概无所知，容当另行前往查明真相。”

孙中山先生只有暂住日本。

英政府1895年放逐中山先生，系援引1882年，第八号条例办理。这一条例内容，原是香港政府1855年1月15日，正当太平天国革命时颁发的。其内容是取缔当地官民干预中国内政。1856年，又下第一号条令，予以补充：太平天国党

羽在香港图谋补充军粮，并于九龙募兵，使香港治安受到影响。1857年1月5日，港府又颁布“维持地方治安条例”。1882年又重订为第八号放逐出境条例，其内容为：“凡在境内之外籍人民有危害治安之嫌疑者，得下令驱逐出境。”1896年，英港政府即据此，不允中山先生返回香港，并下放逐令。但是，孙中山先生并未在香港境内起义，更未扰害香港治安，而竟下令放逐，不但不符合国际法，亦不符合香港政府的地方治安法，完全是以“妨害邦交”为由，并不问什么国际法及其政府之有关法律。香港政府以前放逐孙中山先生，完全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合法的。但是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惟利是图，惟势是趋，对于在野的百姓或革命家，是完全可以任其意而行的。其不允许在本国和领地逮捕入境外籍人，主要为维护自身主权，并非同情与支持革命家等。

这时，为国为民的中山先生，真是处于万分艰难的逆境中。但八天之后，孙中山先生得到日本东京政府正式签发的侨居证，暂住日本，并在日开始一系列活动，并与国内的康有为、梁启超进一步接触。这一切，都是犬养毅等日本友人的全力帮助所致。

早在1893年，中山先生已与康有为有一次不愉快的交锋。当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好看西书。后长兴学舍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近，孙中山先生常至书楼行医。得知康氏有志于西学，欲与结交，但康有为太狂妄自大，一定要孙中山先生先拜他为师，方可见面。孙中山先生见事不可为，便不再提及此事。

康有为及其弟子，当时提倡新学，固属进步之举，但康

氏自号长素，弟子陈千秋号超回，麦孟华号驾孟，韩文举号乘参，颇为时人所怪，而平心而论，此种行为亦太狂妄而不尊重先贤。轻薄而肤浅，绝对不足为训。

就在 1893 年的冬天，时年二十八岁的孙中山在与康有为谋面无缘，堪称十九世纪末中国两大“民间巨头”擦肩而过之际，在广州成立了早期的“兴中会”。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由一群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讨论时局的书生们组成，由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纲。此时之孙中山，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创立兴中会不久，他即萌发了上书李鸿章的念头，他非要和这个掌握中国时局的关键人物“谈一谈”不可。1894 年 2 月，孙中山先生和陆皓东找到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其写信帮助介绍。这样，孙中山先生特意赶到上海。

在上海他们见到了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王韬亦系早期改良主义者，著有《韬园文录》，主张变法甚力。

王韬特意对孙中山先生的上书进行审阅，并修改润色，对孙中山先生表示十分赏识。

同时王韬也写了介绍信致李鸿章幕僚罗丰禄。中山先生的上书最后经罗丰禄的同事徐秋畦呈交了李鸿章。但李鸿章对此不屑一顾。这件事可能对孙中山的刺激非常大。他由对政治的过份的热情转而进入对极权的仇视，自此，内心深处便逐渐由维新转向革命。而当时稳坐权力顶端的李鸿章可能也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三番五次要找他理论一下的青年医生，组织了十几次血腥的武装暴动，葬送了他赖以维系的大清帝国，最后的赢家是后者。

孙中山自此自称“革命家”，活动频繁，并为当局所注目，同年10月，孙中山领到了出国护照，送经日本转抵檀香山。11月24日，中山先生在檀香山重建兴中会，把兴中会由原来的只以倾覆清廷为目的的宗旨，改变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集会成立地点，是卑涉银行（BishopBank）何宽经理家。出席会议的人有何宽、李昌、刘祥等二十余人（二十三人）。

主席为孙中山先生，誓词由李昌宣读，中山先生首行入会议式。其办法如下：

把开卷圣经放在左手上，右手向上高举，恳切求上帝鉴察，然后照誓词宣读：

“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神明鉴监。”

然后讨论宣言和章程，并推举职员。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何定分任正副主席；永和泰商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文案；李昌、郑金、邓前南等为值理。

同时决议发起募集革命军债，并议定革命成功后，以千还百，集得款项数百元。中山先生兄长德彰公捐款最多，其次为邓荫南。同日，会员开始交会银（会底银），每人五元。至1895年6月2日，共收（共58人交银）银二百八十八元。德彰公和邹松盛等又捐献一千一百元，共一千三百八十八元，这是兴中会当时的总经费。

1895年1月，孙中山为回国策动武装起义，自檀香山经日本回到香港，回港后，孙中山入立即邀集旧部陆皓东、郑

士良、陈少白等，于2月18日在香港中环坭顿街十三号挂一乾亨行招牌，也就是兴中会会所。“乾”为天，“亨”为通，当时兴中会的人认为，满族达虏的气数已尽，汉人的天象已是否极泰来，通达无阻了。至此，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

3月13日，孙中山先生开会商讨广州起义计划。16日，兴中会召开干部会议，决议攻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同日，陆皓东提议用他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旗，会议一致采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青天白日旗”的由来，1928年，中华民国正式采纳此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又经过一个多月时间，至10月6日，攻取广州军事计划始定。起义时间为10月26日，阴历九月初九。香港方面由杨衢云、陈少白、黄永商、邓前南负责，谢纘泰负责联络工作。以杨主事，具体购买军械和招募壮士等。广州起义则由中山先生主持并和郑士良、陆皓东共同负责。

10月10日，兴中会总部选举总会长，名曰：“伯里玺天德”，即英文 President，大总统之意。意思是起义成功后，总会长任大总统。

一开会议，当然一致通过举孙逸仙当总统。通过之后，大家就同孙先生拉手，恭喜道贺。这件事情办好，孙先生就想先到广州，预备不再到香港来了。

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先生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他，以后到省城，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孙先生听了这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牛地位之事，非常痛心，精神也受了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陈少白、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

的事情，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陈少白表示不同意，“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了；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入省城办事，办成功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当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陈少白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在事前既然说妥了，会议表决，也无异议，让给杨衢云做总统。第二天，大批起义人士到广州去，只留杨衢云一个人在香港。这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让位。

后来的起义，也主要坏在杨衢云的手上。杨衢云因为已有“大总统”之实，竟先组建了自己的“总统卫队”，并配以良枪，引起人心不服，造成指挥失灵。杨衢云于是电告孙中山，须迟两日出发。就在这两日之内，广东官府已得知密情，调兵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事机遂泄。孙中山先生²⁶日接杨衢云来电：“货不能来。”因当时事机已泄，便回电杨氏：“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哪知电到之时（27日），枪械、人员均已装船，杨明知不可，也未加阻止，仍令朱贵全、丘四向广州进发。并回电孙中山先生曰：“接电已迟，货已下船，请接。”

当保安轮抵广州时，广州党人已无法接应，而船中枪械，又因临时移位而被杂货积压，一时无法取出使用，被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防管带李家焯截获，捕走四十余人。并同时在全城内大搜捕。这是革命党人的第一滴血。当时参加起义的，大多是一些绿林勇士，在他们的意识中，革命还是个比较模

糊的词儿，而且起义的直接动机也是大汉民族主义的理想激励了人们，但是鲜血的流淌毕竟表示了他们的激情和勇猛。

中山先生闻变后，非常沉着，事败后三日，仍留城中。于29日经澳门至香港，又转至日本。孙中山到达神户时，已经见到日本报纸对他的专门报道：《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清政府的通缉令是这样给这次起义定价位的：

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二十几岁。花红银一千元。其次，杨衢云，三十九岁，花红银一百元。

陈少白名列第八，花红银亦一百元。

这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名闻朝野，也由此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

同年（1895年），中山先生决意远游美洲，并向华侨募集资金，以再次起义，于是向各同志商借五百元，作为旅费。但各同志皆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拿出资金来。赵明乐为此辞退管库一职。幸亏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二人合借五百元，中山先生才算筹到了旅费。他从中拿出一百元付陈少白，陈断发改服；又拿百余几付郑士良，再赴香港收拾余众。1896年1月，中山先生也断发改装（西服），将“猪尾巴”割掉，成为职业革命家，只身再赴檀岛。中山先生走后，因陈少白不善交际，会众日少，又不每月交费，办公日益困难。

袁世凯逐渐成为中国军界的明星

正当孙中山奔走英美，又被英美各国政府驱逐，最后辗转日本、彷徨无计之日，在中国政坛和军队，冉冉升起了两颗新星。他们就是袁世凯和康有为。

清朝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使清统治阶级认识了两点：一是满籍军队绿营已腐化到不堪一战，不可依恃，而汉人的战争潜力是巨大的；二是由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对清廷的忠贞，使清廷的统治集团认为汉人仍可信赖。清末的垂危王朝能苟延数十年，便是由于这个信念得到证实。可是这只属于对内而非对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外国一直视为番邦，从没有以平等地位相待。鸦片战争后虽饱受列强的欺凌和迫害，也并不觉悟，直到甲午中日之战，才真正认清自身力量的薄弱可怜。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清朝的海陆军面对小日本竟不堪一击，这一个刺激结束了清廷朝野的旧观念，于是在军事上要整军经武，西法练兵；在政治上要变法图强，除旧更新。

整军经武落到袁世凯身上，演变成北洋军阀自成一系，这是当时清朝统治阶级所没有预料到的。而变法图强则分为两途：一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导致维新运动；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

袁世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成了宠儿，对清王朝来说，他取天下于革命党；对革命党来说，他则是继承清王朝的天

下。

对于康有为来讲，他则成了这时代的悲剧。本来他可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而命运莫名其妙地让袁世凯捉弄了他：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人沉下去了，而另一个人自然浮上来。

袁世凯是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人。袁家在当地是一个世家，袁世凯的叔祖曾官拜总督。在 1880 年（即光绪六年）冬天，庆军统领吴长庆督办山东海防，年轻的袁世凯离开家乡，来到山东从军。1882 年 6 月，朝鲜发生兵变，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直隶总督张树声乃派吴长庆率军前往，剿平乱事。事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 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咨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袁世凯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一个人的成功决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成就，然后加上机会。

就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世人以为袁从小站练兵起家，其实如果袁在朝鲜没有杰出的成就，清朝练新兵的责任就不会交给他，他不在小站练兵，光绪和维新党也不会选中他劝王，他没有谭嗣同要他勤王，就无法向荣禄告密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所以朝鲜的成就是袁一生的开始。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做“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腐败之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自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绿营的制度完全依照明代，官兵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归兵部所辖。到清末绿营缺额在半数以上，也是腐化已极。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各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湘淮两军虽恃功而骄，但数次对外战争，全一败涂地，旧军的弱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下决心编练新军。

李鸿章在直督任内时就锐意摹仿西法练兵，办了一个天津武备学堂，由戈登代为购置新式枪械，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由满人荫昌为总办。可惜军事教育和军队组织并不能配合，因此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被分派到淮军的各军去担任教习，教练新操，而军队指挥权则仍旧在旧统帅手中，一切战略战术依然陈旧，因此甲午之战，淮军一败涂地，淮军中最有名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全军覆灭。这时清廷上下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整军经武必需彻底的大改革。于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练自强军于吴淞，聘用德国教官，一切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另一方面在北洋操练定武军十

营，假小站旧日盛军的营地为练兵场。盛军原在小站屯田，所以有完整的营房和已开垦的稻田，由于盛军覆没于中日甲午战争，因此小站也随之荒废，定武军即以此为营房。

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醇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完全不能“保清卫国”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这时直隶总督是王文韶。清廷最初是派长芦盐运使胡漪淇到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清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漪淇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满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原有4000余人，袁接统后便扩充为7000人，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由于小站练兵完全新式，名目既多，花钱也不少，因此被一般守旧人物所攻击。光绪廿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上章参劾，认为小站兵事浪费国库，清廷派荣禄到小站详细检阅，同时考查训练进步情形。荣禄当时是慈禧的红人，他视察得非常仔细，也因此更深一步赏识袁的才干，和他所练新军的成就。

荣禄的报告到了慈禧和光绪手中，这两位最具权威的人物也对袁有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这时锐意革新，虽然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他能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建议。袁世凯因为练新军颇有成绩，加上他过去在朝鲜的种种作法，使光绪开始对这个小小道员有了好感。

慈禧也对袁有了认识，因为她对于荣禄的话是言听计从

的，荣禄曾亲自看过袁的练军工作，并且对袁甚有好评，则袁的能干有为是必然的了。

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表现能力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徐世昌、唐绍仪、冯国璋、段祺瑞等成了他的幕僚，也使他获得那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对他的重视。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这些特权都是对一个大臣的无比殊荣。

反观康有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出身。他少有大志，想做中国儒家的圣人。曾一个人躲在深山读书，又游历了大江南北，熟读了当时流传于中国的西洋著作，产生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了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撒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两颗忧愤的心灵在一起相撞，它的结果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历史由于这次碰撞而有了一次拐弯。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下午三点钟，康有为和当时清廷著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会见，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这是一幕精采的辩论会。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如今祖宗的土

地都不能守，则还守什么祖宗之法？举例来说：现在谈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不是祖宗时候就有的，因时制宜是适应需要。”他的回答驳倒了荣禄。廖寿恒问：“变法如何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法积久而弊生，而且今昔异势，现在的法律官制实在应该改弦更张，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应斟酌情形逐步更改，这样才能推行新政。”接着他从政治谈到经济财政，又说日本因仿效西洋维新而富强，如今制度已很完备，中国和日本邻近，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次谈话由三点钟谈到天黑才散。

1898年4月28日，清晨。康有为又一次入朝觐见。

他在外书房见到了荣禄，和荣禄先谈了一阵变法的细节和步骤。荣禄和康谈了一会便先上殿见皇帝，光绪问荣禄和康有为谈了没有？荣禄说：“康是辩言乱政。”荣禄退出后，光绪立即召见康有为，年轻的皇帝用兴奋和亲切的颜色和康谈话，先问康的年龄籍贯和出身，然后便叫康陈述政见。

康说：“中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外国侵略是永无止境的。”

光绪说：“这都因为我们太守旧。”

康说：“皇上既然知道守旧弄得这样糟，就该变法维新。”

光绪说：“所以现在非变法不可。”

康说：“近年来已有变法，但只是少变，所谓变法而不全变，结果不会有什么成绩的。须要把制度修改，应该先开制度局。”光绪说：“对，对，对。”康说：“臣曾考查过各国变法的情形，参酌中国的情形，哪几项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条

陈章则，请皇上参考。”

光绪说：“你写的条陈章则都很详备。”

康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颁行呢？”

皇帝看了看帘外，停了一会叹口气说：“我受着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呀！”

康说：“现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是因为用八股作考试文章，学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国情形，但他们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现在朝廷里群臣济济，却没有一个担得起革命重任，就因为八股出身的缘故。”

光绪说：“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学问，中国却做无用的学问。”

康说：“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处，那么把八股废了嘛！”

光绪说：“可以的。不过要办新政财政困难，如何筹款呢？”

康说：“中国矿产很多，可以开发，只要开源，不怕没有钱。”

于是讲到用人行政、社会教育等，光绪都一一点头。最后说：“你可以下去了，还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上奏折。”

康有为出去后，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可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专折奏事，不必由总理大臣代递。

自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至同年八月初六（9月21日），光绪皇帝连续发布诏书，实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加四品卿衔，辅助变法，被称作“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